



吴晗的学术活动、学术观点和政治是无关的吗？

《海瑞罢官》受到批判的近几个月，学术界有不少同志也积极参加了这场思想斗争，但是，也有一些人在窃窃私语。有人说：“把历史剧和现实政治挂在一块儿，以后还要写历史剧”。也有人说：“吴晗歌颂海瑞，是走进了房间，至多是学术观点问题，现在搞成政治问题，就难说了。”有人甚至恶毒地诬蔑说：“对《海瑞罢官》、《谢瑶环》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批判，都是属于‘罗织’一类，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吴晗在他的《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一文中，也煞有介事地“辩白”，一再声称自己“政治上的阶级立场是站错了的，但在另一面，学术思想上的阶级立场，却基本上是旧的、老的、资产阶级，以至还有封建的东西”。吴晗这个所谓“检查”，不是博得了一些人的同情吗？时以人同志就曾站出来大声疾呼地说：“这是可以理解的”，“这是可以说得通的”，否则，你们就“需要提出吴晗同志全部社会实践中的具体材料进行分析”。

真像这个学术的“秘密”之宫，是凛然不受政治“侵犯”的吗？还不是不自觉地人在！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是确实不存在与政治无关的学术，所谓“政治上的阶级立场是站错了的”，只是“学术思想上的阶级立场，却基本上是旧的、老的、资产阶级，以至还有封建的东西”这种陈腐的二元论，不过是吴晗制造出来的自我保护的伎俩。目前发表的大量材料已充分揭露海瑞，无论在三十年代、四十年代或者六十年代，吴晗的“学术”活动，都离不了离开政治。

的确，在五十年代，一九五五年我国学术界展开了规模宏大的批判胡适思想的斗争，而曾经和胡适有过密切联系的老舍的批判胡适思想的斗争，却一直一言不发，只字未写，这种“沉默”，说明了什么呢？它只能说明，吴晗的心里有着，或者是对胡适的“光耀”所及，仍然感戴不忘，不能忘情。所以五十年代的“政治”和沉默，这些也同样不是离开政治，而是密切联系着政治，它表明吴晗是不肯放弃自己的反动立场的。

假使追溯于文坛的吴晗，突然在一九五九年活跃起来，在报纸刊物上发文章，从一九六〇到一九六三年，连《投枪集》（这是他解放前一部分文章的结集）在内，继续出版了《灯下集》、《春草集》、《学习集》，发表报告、演讲、广播稿。吴晗在学术战线上如此活跃，不是像他在《春雷集》（序）里所说：“由于他‘生活在这样伟大的时代里’，才‘写了春天，歌颂春天’”呢？马克思恩格斯绝不会在“一些表面言词上判断一个人，而是要在阶级斗争中听其言而观其行”。不少同志已经揭露了吴晗所排列的研究海瑞的“时间表”，恰像是密切地配合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那才是他们所谓“歌颂”的“春天”。当然，这些黑线绝不只是表现在从《海瑞罢官》、《论海瑞》到《海瑞罢官》的一根线上，而是贯穿在吴晗这十年来的整个“学术”活动中。现在我们就联系起来看一看，吴晗在整个“学术”问题里究竟都宣扬了一些什么货色，而这些宣扬又都针对着什么人？

精心挑选推荐历史人物、历史教训，借古非今，为被罢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打气

吴晗为了右倾机会主义有一日“再置霸案整纪纲”，不仅煞费苦心给他树立了个“不为强暴屈服，不为失败所吓倒，失败了再干”的高大的英雄形象，而且精心地挑选推荐了一些具有所谓“海瑞精神”、并被罢官要押的历史人物，象况钟、周忱、于谦等，进一步给右倾机会主义灌注“斗争”的“勇气”。在《况钟和周忱》一文里，他为况钟的所谓“直率的批评精神”，毫不隐讳”，大叫其好；为周忱的“一言”“此露深藏的愤慨，最奇者便是《明代民族英雄于谦》一文，则更明显，这本应该是篇一篇写“民族英雄”事迹的杂著，可是，此文一开头却引了于谦的《石灰吟》，“巧为造作”出来的冤案。别用用心地造出了赵括和韦陀，他们“吃了主观主义的亏，吃了教条主义的亏，自以为是”，“根据主观愿望，想改变客观现实”，“不顾客观现实，不听有实践经验的人民的劝告，结果是摔了大跟斗”，还说什么这种“害己、害人、误国的教训”，“时间虽然隔得很久了，今天来重温这些教训，看来还是有益的”。一向主张不能用人物标准来评价历史人物的吴晗，却为什么给这两个历史人物制造了这样多现代化的语言，而且赵括和马谡的失败，分明是由于两次失败部署的错误。吴晗却高踞万里地大谈其“这是‘根据主观愿望，想改变客观现实’的实际”，这不是风牛马不相及吗？但是在，在三十年代闹时期，右倾机会主义不正是假借他们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背叛苏约所造成的困难，把同样语言的污水洒洒在我们伟大的身上吗？吴晗这位历史学家是懂得借题发挥的，也善于“指桑骂槐”的，他给右倾机会主义的“教训”射出攻击现实的子弹。

吴晗是怎样精心挑选推荐的这些历史人物和“历史教训”，是何等密切地联系着“整”——“反”——“要”这些活动，何等密切地配合着右倾机会主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行动。而吴晗何以如此积极地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大捧场，大喝采，大打其气，他恰证明，他一直“站错”的立场是二十多年来始终不变的反动政治立场。他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又看透了他们一直在赞颂的“民主主义”者的阴谋，从而，期待他们能够成为“中国前进的引导者”，“决定一切，执行一切”，“竖立这新基础”，以建设他所向往的资产阶级专政。

和右倾机会主义者唱同一腔调，在文教战线上反对党所领导的学术革命和学术革命

在一九五八到一九五九年的大跃进年代，由于政治、经济和思想战线上的革命高潮形势猛烈地冲击了学术界和高等学校的厚古薄今的倾向，一批革命的学术工作者和高等学校广大的马克思主义新生力量，空前地发动了革命的批判的攻势。他们开始攻击毛泽东同志的把过去被统治阶级所歪曲和颠倒了的历史翻过来，恢复劳动人民作为历史主人的伟绩和功绩，着手重新写历史。这是反对阶级和资产阶级长期统治的思想解放第一次面临来自无产阶级专政的威胁，它激起了垄断着这块地带的资产阶级学者们的强烈的仇恨，终于在困难的年代里配合着资产阶级、封建势力的复辟活动，和右倾机会主义者在政

在吴晗的“学术”活动中贯穿着一条什么黑线？

李 希 凡

提 要：吴晗的“学术”活动以及他所宣扬的学术观点，都贯穿着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解放后他在一系列文章、报告、演讲里，精心选择、推荐历史人物、历史教训，美化帝王将相，宣扬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反动历史观，鼓吹继承剥削阶级道德，大力提倡所谓新历史剧的创作，都有其现实政治目的。吴晗将着“学术”外衣贩卖反党反社会主义政治观点的资产阶级代言人。

作者对自己在一九六二年历史剧争论中的错误观点进行了自我批评。

政治战线上对党的猖狂进攻互相结合，在文教战线上来了一个大反扑，右倾机会主义者和霸权大跃进的政治经济战线是“一而二”，资产阶级文人士们就集中在学术领域里的教学革命和学术革命是“添漏补缺”。在这次反扑中，吴晗是一个活跃的斗士。他不只一次在报告、演讲和文章中尖刺地嘲笑一九五八年的学术革命，把攻击的矛头指向革命学术工作者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研究历史的指针。他在《历史教材和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一文中说，“只从今天的某些政策、方针出发，强迫历史实际服从今天的实际，是非科学的，非历史主义的学风。这个苗头很不对头……我们必须坚决反对。”，这时自称三十年代“就无条件地接受了历史唯物论”的吴晗，这时候完全抛掉了他的假革命的外衣，对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历史的倾向，表示强烈的仇视。他后来的东西才是历史，因此对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只有右倾机会主义，唯心主义，旧历史是毫无可信的，这是他对祖国旧有的历史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而且不只一次恶毒地讽刺利用经典作家意见的历史书，是“浪费笔墨，还浪费了读者的时间”。为了反对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研究历史的指针，他提出了他自己一整套的“论从史出”的反动观点，而且居然大声疾呼：“中国史家有一个据实记事的好传统，即使有客观之祸也不怕”。

对党所领导的学术革命、学术革命持如此深恶痛绝的态度，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又表现了如此强烈的仇恨情绪，而对保卫资产阶级、封建阶级的旧史学阵地，又别有用心地强调要继承以身殉难的“传统”，难道这仅仅是由于吴晗学术思想上的错误吗？实际上无产阶级是替无产阶级和说出一副可相等的今天，吴晗都很“清醒”地意识到，这是一场打着学术问题旗号的尖锐的阶级斗争。在这里，学术即政治。因为他很懂得，能够守住这个阵地，就可以为资产阶级、封建阶级的复辟准备思想基础，就可以隐藏在复古主义的历史外衣下，寻找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新武器。

美化帝王将相，宣扬敬祖、继祖，配合资产阶级、封建势力的猖狂进攻

在一九六一年、一九六二年间，和资产阶级、封建势力的复辟活动相配合，在学术研究中，也响起了一个颂扬帝王将相的声浪。资产阶级学者们们的学术革命后出现的这次反动思潮高涨，妄想重新复活他们的黄金世界，在山东曲阜居然演出了一场拜孔的丑剧。而在这一片“颂祖”的声浪中，吴晗又是一个高潮。他在一系列的报告和文章中，借口反对“唯成份论”，反对运用阶级观点评价历史人物，大声疾呼：“阶级出身本身是评价历史人物的根本条件”，决不是评价历史人物的“唯一尺度”；反对批评“古人的局限性”，认为“拿这个来批评古人，我看并不是合乎原则的”，反对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意见和农民的政策，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指责许多历史教材美化毛泽东同志这一光辉论点，“特别强调农民起义”，这是根据历史“添漏补缺”，大力鼓吹“在过去的历史时期里，在‘某项政治措施，工程建设或大规模的战争里’，‘起主导作用的’，‘领导和指挥了这些工作的’，是帝王将相；鼓吹‘盛世的帝王将相’代表‘历史上的光明面’，而且还特别强调说：“不能因为这个人是个皇帝、是国王、是宰相，是将军，他的阶级成分不好，就不承认他在历史上的贡献；也不能因为说这个成份不好，一无所有，贫农出身不好，可是他一輩子没有什么成就，也就把他写在历史上，这样，历史就太多了，该不胜利了，也就把历史忘了”；他大声疾呼：“把我们的祖宗（指帝王将相——引者）完全说成坏人，祖上的历史添漏补缺，我们全部删掉之”，我们的历史只是今天才从开头开始，把历史切断了，这有什么坏处呢？

吴晗的得意忘形，显然使他忘记了一个平凡的真理，即他所敬慕的这些祖宗，只是依靠剥削那些“一輩子没有什么成就”的贫农农人的血汗，才有了所谓奢侈的“盛世”，而且那“盛世”所有一切，也都是劳动人民创造的。

吴晗虽然也勉强了，敬祖崇，从祖宗，也还是有个“阶级问题”。中国无产阶级所敬的祖宗，只能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的”，“融贯古今，富于革命传统”的古代劳动人民。至于吴晗自己，如果宁愿说帝王将相作祖宗，那是吴晗的自由，却不能因此而定，批判了帝王将相，就把“我们的祖宗完全说成是坏人”，“我们全是坏人的子孙”，不管吴晗怎样暴跳如雷，而历史事实却是改变了的，不同阶级的人只能有自己的祖宗。中国无产阶级自从从来是向帝王将相顶礼膜拜的，这也是他们的“阶级出身”、阶级利益所决定的。

为什么历史事实不是刚刚展开革命的批判的祖宗，就发生了吴晗的无名之火呢？真真儿是由于帝王将相“祖宗”的脸上多了几块白粉吗？马克思恩格斯应当通过现象探究本质。阳亡了，为他们的现实斗争服务，这是资产阶级历史学家的传统。当资产阶级来到命运的时候，他们又梦想出这旧的历史的一页，以救被毁灭之日的到来。我们近年来的意识形态领域的尖锐斗争，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资产阶级宣扬敬祖、继祖的声浪，恰像是发生在农村封建文化泛滥、地富反党大肆进行连续复辟、修祠堂等反动活动的时刻，因而吴晗和志同道合者，在所谓“学术”研究中，颂扬和美化封建统治阶级，实际上也就是企图运用反动的传统力量的一百年来的潜移默化影响，为他们今天的子孙，——已经明了的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夺权夺势地位。

鼓吹继承剥削阶级道德，借以对抗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人民，阻碍人民树立社会主义世界观

和美化帝王将相相联系，吴晗还不遗余力地鼓吹继承封建道德和封建道德。他在《春雷集》（序）里，公开声明：“这两年我把主要力量放在历史人物上”，“希望通过历史人物的榜样，让广大人民了解中国悠久的历史，学习我们伟大先人的精神，从他们勤劳、勇敢、勇敢的精神中，吸取精神力量”。而在吴晗的心目中，这所谓“勤劳、智慧、勇敢的精神”，又只是来自封建统治阶级的。因为他认为，第一，被统治阶级、劳动人民是没有自己的道德的，即“所谓阶级的道德也就是统治阶级的道德”；第二，无产阶级不能“凭空创造”自己的道德，

所以只有“善于吸取过去统治阶级某些优良的东西”，使它们“成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德的组成部分”。于是，在他看来，甚至连“忠孝节义，礼义廉耻”这些封建道德教条，都可以把它改造，使它们为社会主义服务。（《学习历史知识的几个问题》）；连资产阶级的“精打细算，多方赚钱”的“道德”，也要把它“继承”为“社会主义经营管理企业的一条重要原则”（《见《读报摘要》》）。吴晗明确地宣布过：“共产主义革命是同过去传统下来的所有制关系实行彻底的决裂”，所以，毫不奇怪的，它在自己发展的过程中要同过去传统下来的神观念实行彻底的决裂”！但他为什么还要鼓吹继承封建道德和资产阶级道德呢？这犯了痴人说梦的错误吗？显然不是，吴晗提倡继承封建道德和资产阶级道德的目的，同他提倡为资产阶级复辟活动提供精神武器，以对抗当前出现在我国广大群众中间的共产主义精神的闪光，不是吗？正当吴晗狂热地说：再讲、三讲道德的——一九六二年，也是伟大共产主义战士雷锋、欧阳海、王杰、焦裕禄，正在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以他们崭新的精神面貌开辟前进道路的时刻，而且早在一九五八年，毛泽东同志就已充满革命豪情地指出过：“共产主义精神在全国蓬勃发生。广大群众的政治觉悟迅速提高。群众中的落后阶层奋起要求努力赶上先进阶层。这个事实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关系（生产关系方面尚未完成改造的部分）、政治关系、思想关系、技术关系，文化关系正在向前迈进。……人这样多，热气高，干劲大。从来没有看见人民群众象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过去的剥削阶级完全陷落在劳动群众的汪洋大海中，他们不想变也得变，至死不变，愿意带着花岗岩头脑去见上帝的人，肯定有的，那也无关大局。一切腐朽的意识和上层建筑的东西，它们不适用的部分，一天一天地土崩瓦解了，彻底扫清这些垃圾，仍然需要时间；这些东西前滚之势已成，则是确定无疑的了。”（介绍一个合作社）

剥削阶级决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更是如此。吴晗正是看出了这些腐朽的意识形态的土崩瓦解，看到了“这些东西前滚之势已成”，看到了毛泽东思想在广大群众群众中的开花结果，看到了人民群众的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而不甘心自己的阶级“完全陷落在劳动群众的汪洋大海中”，才妄想用鼓吹继承剥削阶级道德的垂死挣扎，重筑那已经开始倒塌的剥削阶级的思想阵地。

妄图把历史剧创作纳入借古非今的轨道

吴晗在他的“自我批评”一文里，再再说他创作《海瑞罢官》的时候，“写这个剧本的目的，在当时是不清楚的，是糊涂的”，“古为今用”、“厚今薄古”的原则在当时一点也没有想过，完全是为古而古，为戏而写戏，脱离了现实，脱离了现实”。不少同志拆穿指出这个自欺欺人的谎话。我在和别的同志会写的《不能利用历史文混是假的》（三月十六日本报）一文中，也曾揭露和分析了那事理的真实。其实合起来在《海瑞罢官》里刚规定的目的，吴晗就和志同道合者一起起高潮来，称兄道弟，大谈历史观：“不是为了死人，而是为人服务”，“分清界限，吴晗那把柄于于提倡历史剧的创作，一论再论，一再再讲，写了有关历史剧文章达十四篇之多，并且还主编了一本《历史剧要论》，俨然以指导者自居，不断重复他的关于历史剧创作的‘主张’，号召‘历史学界的同志们，大家来写历史剧’，参加他的‘主张’，这一切，也都表明，他何尝忘记过‘古为今用’，‘为人服务’的原则。用以类聚，孟超和田汉，正是在《海瑞罢官》的‘带子之’，放出了《李慧娘》和《谢瑶环》这两棵大毒草，使戏曲舞台上的这个反动社会思潮有了一定的‘声势’。

从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三年，报纸刊物上发生了一系列关于历史剧问题的争论，这争论就是从吴晗挑起的。现在问题已经十分复杂，吴晗何以那样卖力“关心”历史剧的创作，“指导”历史剧的创作，是有用心的。他很了解戏曲的武器作用，在谈论历史剧的文章中，不只一次地强调，“戏剧的作用是远远超过书本的”，“历史剧是有其重要作用和意义的”，“历史剧的目的，是要今天学习、吸收古人的某些好的品质”。他“破门而出”，在《海瑞罢官》中树立历史剧的“高大形象”，不就把这个“目的”表现得清清楚楚了吗？《海瑞罢官》一改再改，多次反复，不厌其烦，达七遍之多，最后在“要害”的主题中得到了完成，就是为了突出历史剧的“不为封建势力服务，不为失败所吓倒，失败了再干”的“好的品质”，而让右倾机会主义者们“学习”“吸收”，为“右倾机会主义者们”。

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新历史剧，应当怎样创作新历史剧，毛泽东同志本来早在延安平剧院改组《逼上梁山》的一九四四年，就给我们指出了明确的方向：即必须把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们统治着的历史剧舞台翻过来，恢复劳动人民的舞台主人公的地位，表现历史上的人民群众和人民群众的阶级斗争，肃清封建的史剧在人民群众中间长期散播的思想毒害。可是，全国解放以后十六年来，我们的文艺界一直贯穿着一条对毛泽东文艺路线的反动叛乱，在戏剧改革推陈出新的工作中，不但没有《逼上梁山》的传统，新成风，推向全国，甚至完全把毛泽东同志的这一重要指示，置诸脑后不提起了。这就使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们仍然长期统治着戏曲舞台，直到一九六四年发展资本主义的阶级斗争，才“排除出新”的方针显示了真正伟大的威力；而且十八年来，真正如毛主席同志所要求的用历史唯物论观点改造新的历史剧也并不多。正是因此这样，一九六〇年以后，戏曲舞台、历史剧的形式，才成了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场合。吴晗、孟超、田汉就都看准了这个“武器”。吴晗所以特别强调历史剧的“人物、事实要真实”，甚至，“无一字无来历，无一事不出处”，就是企图要历史剧作者仍然沉陷在封建统治阶级的泥坑里，继续为帝王将相歌功颂德，这就是他那那样强调“历史真实性”的含义。他所谓的“历史真实”是要表现“那个时代的时代精神，而不是今天的时代精神”。是要表现包公、海瑞是“好人”，不能“把他们写成坏人”，是对于这些“好人”，“不一定非要指出他的同时，逐一指出他对于缺点不可”，是写唐太宗、武则天这类皇帝，“不要写又歌颂又批评。要不然，就会在观众中造成混乱，分出这是好人是坏人，还是半个好人，半个坏人，教育意义也就完全没有了。这是分寸”。“是如实地估计某些帝王将相——当时领导人的作用”。总之，他反对有些历史剧把统治者写成“离离离离”，反反对封建统治者写成“只能由百姓牵着鼻子走”。他认为这不但不符合历史事实，也降低了历史剧的教育意义。

吴晗一方面要求历史剧歌颂、美化“当时领导人”——帝

王将相，一方面又反对历史剧“抬出人民群众来”，指责有些历史剧“不适当抬高人民群众的作用”，“一大群人民群众上台了，就表现现了人民群众的力量，不致受统治者历史上的作用，这恐怕就把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观点庸俗化了”。

请看，在吴晗所强调的“历史真实”性里，他对人民群众登台戏舞台有着多么反感的情绪，而所谓“当时领导人”的帝王将相，又是怎样的受保护，所以吴晗的历史剧见解，吴晗的“对历史剧创作和历史的真实性”也充分表明了，他企图把历史剧创作纳入反党反社会主义和复古主义的反动社会思潮的轨道，在他看来是学术问题的史实和虚构关系的争论中，吴晗所要求的“历史真实性”，也分明显示了强烈的政治倾向，是要历史剧的“历史真实”为他的反动的政治观和历史观服务的。

吴晗是一个披着“学术”外衣贩卖反党反社会主义政治观点的资产阶级代言人

以上就是从一九五九年以来吴晗的所谓“学术”活动的一个粗略的缩影。真可谓从史实到各条战线上全面出击。情绪是如此狂热，旗号是这样明确，理论和创作实践又如此“统一”，政治和学术的配合是这样的紧密！这一切的一切，难道都是什么“政治上的阶级立场是站错了的”，只是“学术思想上的阶级立场，却基本上是旧的、老的、资产阶级，以至还有封建的东西”吗！我们奉劝吴晗，这不是要捧花枪吧！铁的事实岂能是一句空话，即你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的确是站错了的，你的反动的政治观和历史的反动政治活动，是紧密结合、互为一体的。我们是否劝那些在窃窃私语的人们，还是把眼睛睁大一点吧！看看你们究竟是在为什么人服务？为什么“学术”辩护？

马克思主义者一向以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的关系，是辩证的关系。这就是说：学术总要隶属于一定阶级的政治，没有超阶级的学术，也没有与政治并行的学术。但学术问题完全等于政治问题，学术和政治的联系又有区别。学术文化不完全等于政治，如果违反了毛泽东同志所提出的六条政治标准（其中最主要的就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那就是政治问题，不但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完全同起来，但是，我们也不能不允许多用学术的幌子来掩盖政治问题。从以上种种可以看出，在吴晗的所谓“学术”活动中，从头脑里贯穿着一条反党的黑线，那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吴晗是一个披着“学术”外衣贩卖反党反社会主义政治观点的资产阶级代言人。

我们必须看到，通过所谓“学术”问题，利用剥削阶级还有统治权力的这个最后堡垒，对党对社会主义猖狂地进行搞反革命复辟，已经成为新形势下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阶级斗争的重要手段。在进攻时他们手舞足蹈，嚣张得很，等形势不再有利的时候，他们又妄图借借学术问题的外衣，退却下去保持机会主义卷土重来的阵地。吴晗和他的同志同走合正是这样，现在当人们摆事实，讲道理对他们进行政治上的批判，他们又想打起“学术问题”的盾牌，阻止人们进行政治上的批判。要知道，这是办不到的，社会主义的学术，只能是为人民服务，为无产阶级所掌握的学术，决不允许为少数人所垄断，更不允许利用“学术”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有错误就得批评，有毒草就得进行斗争”。革命人民一定要把这场大是大非之争进行到底！

关于历史剧争论的自我批评

在一九六二年，我是参加了历史剧争论的，在这场争论中，我的思想观点有严重的错误：

（一）由于缺乏历史、阶级斗争观点，也由于封建阶级、资产阶级的思想在我的脑子里还有很深的根子，我的历史观见解是混乱的。在历史剧问题中，我谈到过曹操、武则天这类人物“毕竟是皇帝”，不能“有意识地美化”，谈到过海瑞“毕竟是封建官吏”，“不能把他所不能有的思想强加给他”，还肯定海瑞“在封建时代为人民做了不少好事”。自以为这是在进行阶级分析，而实际上是阶级调和论。在《阿Q、典型、共名及其我》一文中，我批评过海瑞的共性的来概括典型人物的物品是超阶级的理论；说：“在这样的问题上用抽象的形容词，是很危险的。……正庄、廉洁、不是瞬息在官宦统治下的人民的‘愿望’，而是对封建统治阶级对于忠于封建统治阶级的官吏的‘个人’要求吗？又是戏曲舞台上出现过的情节、状况、……这样这样的人物，他们几乎全是受变人民的‘理想’的化身，……海瑞能够因此比海瑞和其他人所体现的阶级矛盾的而，这恰像是表现封建统治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共性的概括吗？实际上它恰像是表现了封建社会的劳动人民的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性，需要我们认真地进行阶级分析的关键所在”。（一九六二年第二期《新建报》）但是这种观点本身并没有克服折衷主义，因为海瑞之类的物品本来就是对封建阶级的骨干，他们所维护的从来都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他们所干的，从来都是压迫、剥削人民的坏事，根本谈不上替人民做过什么好事。戏曲舞台上所以出现这类人物，根子在于封建统治阶级的制造偶像、欺骗宣传，妄图借此麻痹群众们的反抗斗争，而不是什么劳动人民的历史的阶级的局限性。所以这所谓“批评”，不仅没有触动帝王将相反动历史观的一根毫毛，而且实际上是帮帝王将相出钱它帮了腔。至于对《海瑞罢官》和海瑞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险恶意图，我就更毫无觉察了，甚至还肯定了一棵大毒草《海瑞罢官》在史实和虚构的处上“比较成功”。脱离政治只谈艺术的结果，就给反动的政治开路。

（二）历史剧的争论发生在一九六一年初，吴晗的第一篇《谈历史剧》的文章是发表在一九六〇年底，这时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又开始占领戏曲舞台，但是，一九五八、一九五九年的文化革命，戏曲演现代戏的初步尝试，对于他们还记忆犹新的。因此，不少同志反对吴晗用历史记载的所谓“人物、事实要有根据”的论点限制历史剧的创作，提出应当由劳动人民去创造戏曲舞台主人公的地位，坚持新历史剧的革命方向。论争本该从继续深入，而我的参加争论，却没有抓住本质问题，只是陷入史实和虚构的艺术处理上的分歧，把戏变成了历史“正名”之争，反而给吴晗招来了不少支持者，在读者中制造了混乱。

这由于所谓新历史剧所展开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思潮，给了我错误的教育。历史剧创作的中心问题，是什么史实和虚构的关系，而是站在什么立场上用什么观点写历史剧，是历史剧的那个阶级服务的。我在和冯其昌同志合写的《田汉的戏曲理论》是一棵大毒草》（发表在一月二日本报）一文中，说明了一点我们的初步认识，这里不再重复。

在我们的思想战线上，一切彻彻底底清除一切剥削阶级毒害人民的思想意识的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广大工农群众和马克思主义的新生力量已经拿起武器，用伟大毛泽东思想的锐利武器，对学术文化领域里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害，对资产阶级、封建阶级的意识形态进行了猛烈的反攻。照照镜子，看看自己，从历史剧问题中暴露出来的思想错误（而绝不只是这篇毒草，其他一些文章也有不少错误缺点），使我深深感到，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的思想对我还有很大的影响，我愿在这场尖锐的阶级斗争中，努力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努力向工人学习，向先进、向战士，继续清理、批判自己头脑里的错误思想、错误观点。

